



上海金融学院“十二五”内涵建设项目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发展环境专项研究

(一)

吴大器 张学森 等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42-1846-1



9 787564 218461 >

定价：42.00元

F832.751
10009

上海金融学院“十二五”内涵建设项目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发展环境专项研究

(一)

吴大器 张学森 等著



90448063

南京工业大学
图书馆藏书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专项研究(一)/吴大器、张学森等著. —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642-1846-1/F·1846

I.①上… II.①吴… III.①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研究-上海市
IV.①F83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7308号

- ☐ 责任编辑 顾晨溪
- ☐ 封面设计 张克瑶
- ☐ 责任校对 卓妍 赵伟

SHANGHAI GUOJI JINRONG ZHONGXIN FAZHAN HUANJING ZHUANXIANG YANJIU(YI)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专项研究(一)

吴大器 张学森 等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321号乙 邮编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上海景条印务有限公司装订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710mm×1000mm 1/16 13印张 269千字

定价:42.00元

编委会

主 编 吴大器 张学森

编 委 张毅强 郭湖滨 邵丽丽

郁佳敏 殷林森 储 峥

前 言

按照国家战略,上海将在 2020 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离这个目标的实现,我们只有不到 6 年的时间了。时间如此紧迫,而任务如此艰巨。同时,必须加快推进金融中心创新发展,才能发挥其上海“四个中心”建设进程中的带动和引领作用。为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发展环境优化,上海金融学院在“十二五”内涵建设项目中专门设立了“卓越金融人才培养的产学研合作教育研究”的系列课题,以期调动更多专家学者参与其中,通过系列研究成果,为优化和完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咨询意见。本书即为该系列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是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专项研究(一)》。

本书从发展环境的基本体系、法制环境优化、上海金融服务供求关系与现代服务业发展、金融监管会计准则的差异与协同的实证研究、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业规范发展比较研究等方面,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的相关方面进行了专项研究。同时,作为本书第六章以“上海‘四个中心’融合发展中坚实前行 金融中心的 核心引领作用日益凸显”为题,对上海“四个中心”的由来、目标、内涵和国际金融中心的 核心地位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如何发挥金融中心在“四个中心”建设中的 核心功能和上海“四个中心”的融合发展,进行了理论思考,提出了政策建议。本系列课题的研究,既重视理论探讨,更重视实际需要,形成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积极意义。本书的部分研究成果,曾形成决策咨询专报呈报了上海市相关部门,受到市委、市人大、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和肯定。

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的基本体系,本书第一章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理论综述与整合,在对其基本概念、分类、产生模式及形成要素进行界定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众多新兴学科和理论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历程中不断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研究靠拢,形成了“路径依赖是基础—功能观是延伸—金融生态学是趋势”的理论研究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运用路径依赖理论考察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变迁机理,运用金融功能观深入考察了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目标和环境体系及其金融中心功能建设的环境载体和发展路径,引入金融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从宏观的外部金融生态环境、中观的区域金融发展环境和微观的城市金融市场环境三个层面考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生态环境体系。最后,对优化和完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的基本体系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法制环境的优化与完善,本书第二章认为:我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虽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特别是满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的法制环境尤其是金融法制环境,还远没有形成,需要不断优化和完善。作者认为,金融法制环境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而优化法制环境的核心就是要进行金融法制改革;为适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法制环境的需要,我国应该采取在浦东陆家嘴设立“金融法律特区”的模式。本章在探讨金融法制环境优化的基本理论问题基础上,对法制环境优化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和借鉴研究,分析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法制环境优化的过程、现状、成绩和不足,提出了优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法制环境的思考和建议,包括发展方向、模式和途径,战略阶段、目标与措施。

关于上海金融服务供求关系与现代服务业发展问题,本书第三章认为:现代服务业健康、快速发展又面临着金融服务供给的约束,离不开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和壮大。在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我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而现代服务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商业银行强有力的金融服务支持。如何发挥商业银行金融资本的配置作用,促进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章首先描述了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然后选择现代服务业的若干典型行业,具体分析其快速发展面临的金融服务约束和挑战,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金融机构支持上海现代服务业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于会计生态系统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本书第四章认为:第一,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看,会计是其在整个社会各个方面“融合协同,循序渐进”中的不可或缺的基础组成部分,金融越发展,也越会对会计的变革和创新提出要求;第二,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轨迹与会计发展轨迹存在不断重复的规律,即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和发展时期与会计中心转移的路径和发展时期高度吻合,而会计理论创新或制定准则话语权大多与该地区在金融中心中的地位高度相关;第三,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和会计作用、地位均处于我国国家战略执行期,两者的关系存在关联并基本匹配的特征;第四,构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需要的“会计生态系统”要从经济主体、内部环境、阶段性发展目标上齐头并进,并在多个方面形成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互磨合到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进程。

关于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业的规范发展问题,本书第五章认为:我国融资性担保行业监管仍然停留在粗放阶段,尤其是担保机构的风险监控指标体系尚未建立,离科学、审慎、长效的专业性发展目标存在较大的差距。2012年2月发生的“中担事件”,银行与担保业的合作面临断裂风险,融资性担保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可能会面临“连锁反应”。因此,亟需建立起“防火墙”式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防范融资性担保行业可能出现的业务萎缩系统性风险。本章着重建立融资性担保机构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监测和预防担保机构的风险,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特别是要引导和扶持融资性担保行业为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服务和“三农”融资。

关于国际金融中心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关系问题,本书第六章从历史、现实以及统计规律角度,论述了上海“四个中心”目标意义及其内在关系。认为:(1)上海“四个中心”目标确立有一个循序深化确立的“3+1”的过程,即20世纪90年代的“四个中心”目标提出→2001年为标志的“四个中心”目标确立为国家战略→“十一五”至“十二五”时期的上海“四个中心”目标的深化→“十二五”至2020年为止的基本建成的“四个中心”社会主义大都市目标的上海实现阶段。(2)上海“四个中心”的内涵相互间是促进支持转化的辩证关系,需要予以动态发展诠释。就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建设内涵来看,上海在具备强大的经济总量、很高的国际影响力的基础上,着力调整产业结构,打造真正的先进制造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并推动经济

中心与服务实体经济建设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协同发展,是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建设的本质属性。(3)融合发展的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更需要金融担当起引领责任。以经济中心建设为目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建设;以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建设为手段和措施,服务并推动经济中心建设。在“十二五”时期到2020年,全面推动“四个中心”的融合发展,真正实现把上海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目标。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未来八年国家战略实施阶段,融合发展中的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更需要金融担当好引领责任。

基于系列课题研究成果的特点,本书的编辑委员会是:主编吴大器、张学森;委员包括张毅强、郭湖滨、邵丽丽、郁佳敏、殷林森、储峥。对于研究团体成员的积极努力和贡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希望在本书基础上,有更多更好的相关研究成果涌现,以形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专项研究》的续篇。

吴大器 张学森

2014年7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的基本体系研究	1
一、核心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1
二、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研究的基础理论	5
三、基于路径依赖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分析	9
四、基于功能观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分析	14
五、基于金融生态观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分析	18
六、完善优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的对策建议	23
第二章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法制环境优化研究	29
一、优化金融法制环境的基本理论	29
二、优化金融法制环境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35
三、优化金融法制环境的国内比较与借鉴	43
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法制环境的发展过程及现状、成绩与不足	49
五、优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法制环境的思考与建议	57
第三章 上海金融服务供求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	65
一、上海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布局与发展趋势	65
二、上海现代服务业典型行业金融服务需求分析	72

三、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上海现代服务业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88
第四章 推进会计生态系统建设 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	96
一、引言·····	96
二、会计生态系统服务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理论依据·····	97
三、会计生态系统服务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实务依据	
——基于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差异和协调的视角·····	99
四、会计生态系统服务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实证依据	
——基于会计信息在金融系统中解读的经验证据·····	114
五、提升会计生态系统基础效应与发展效应的构想框架	
——基于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视野·····	120
第五章 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业规范发展比较研究 ·····	126
一、绪论·····	126
二、融资性担保机构行业发展状况和监管问题分析·····	130
三、融资性担保机构的风险分析和风险管控·····	137
四、融资性担保机构风险评价方法·····	140
五、融资性担保机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43
六、总结·····	152
第六章 上海“四个中心”在融合发展中坚实前行 金融中心的核心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	154
一、上海“四个中心”目标的确立与由来·····	154
二、上海“四个中心”的内涵及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分析·····	155
三、发挥金融中心在“四个中心”中的核心地位尚需努力的地方·····	181
四、融合发展的上海“四个中心”建设·····	187
参考文献 ·····	192
后记 ·····	197



第一章

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的基本体系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中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活动的集中地,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和参与全球资源分配的控制中心。国际金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国际金融中心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标尺,许多国家都把建设、发展或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作为重要战略。中国要在 21 世纪实现和平崛起的发展目标,确立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成为国际金融活动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的参与者,就必须尽快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曾在 60 多年前作为亚洲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享誉全球。1992 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确立为国家战略。温家宝前总理在 2008 年视察上海时明确指出,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要在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健全领导体制和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全面提升服务功能、提升发展的软环境、培养和吸引人才六个方面全力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2009 年,国务院原则通过 2020 年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意见,要求基本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09] 25 号),优化金融发展环境成为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六大任务之一。

一、核心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的基本体系研究涉及经济学、金融学、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多元理论,其基本概念和理论的使用需要在自身独特的研究框架中重新进行界定和整合。

(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分类与产生模式

1. 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

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尚未完全统一。西方金融地理学多从功能和地理范畴两个方面定义金融中心,如 Kinderberg(1974)从功能角度将金融中心定义为聚集银行、证券发行者和交易商,承担资金交易中介和跨区域价值贮藏功能的中心区,而 Thomas Gehrig(1998)则更偏重从“地理”意义上界定金融中心。David

J. Porteous(1993)将提供高端金融功能和服务的特殊金融部门的空间集聚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本质特征。国内学者饶余庆(1997)则将国际金融中心视为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高度集中,各类金融市场能自由生存和发展,金融活动与交易较其他地方更为高效的都市;吴念鲁和杨海平(2008)则将国际金融中心界定为基于低交易成本、高交易效率以及城市的强积聚能力而形成的金融人才、金融机构、金融信息、金融资本和金融交易的集聚地,其业务覆盖面跨越国界。

综上所述,国际金融中心至少具有四大特征:(1)具有较好的金融广度。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通常依托于某个经济发达的国际性大都市,具有健全的市场经济基础。(2)具有很强的区域辐射力。国际金融中心一般实现了生产要素和劳动力的理想配置,金融业务辐射国际市场。(3)具有很高的开放度和优良的地理位置。国际金融中心的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量巨大,汇集全球一流的金融机构,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发达。(4)具有强大的信息交流能力。国际金融中心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发达,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收集、交换、重组和解译的成本。

2. 国际金融中心的分类

金融中心可从地区角度划分为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国内金融中心仅为国内特定地区的居民提供金融服务并承担国内资源配置功能。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至少跨越两个以上司法区域,但未覆盖全球;有很高程度的国际资金、机构与人才的参与,但市场规模稍逊,种类不全;具有一定的金融创新及产品定价能力,但限于特定区域而非全球市场领导者。目前,这类金融中心包括中国香港、东京、巴黎等。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层次最高,金融市场规模大、种类齐全,人才集中,服务覆盖全球,是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和定价中心,主导金融全球市场发展。伦敦和纽约是目前市场普遍公认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也可依据运作模式分为实力功能型、代收集资型和簿记服务型。实力功能型金融中心(如纽约、东京)以国内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资金源自全球而主要服务于国内,开放程度不如代收集资型。代收集资型金融中心(如伦敦、新加坡、中国香港)资金来源广泛但流向全球,因而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簿记服务型金融中心则纯粹为国际金融活动提供记账服务,一般不发生实际的金融活动。前两种国际金融中心的灵魂都是强大而成熟的资本市场。

3. 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模式

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有两种不同的模式:自然渐进模式和国家(地区)建设模式。

自然渐进模式以伦敦、纽约、东京为代表,往往基于国家经济实力发展起来,其形成和变迁过程折射了国际经济格局的整体变动。自然渐进模式发展的一般轨迹是:随着贸易经济的发展,特定城市或地区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进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再逐步成长为全国性金融中心;随着对外经济贸易联系的广泛发展,这些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形成了能够在国际层面上为各种金融业务活动提供最大便利的国内金融市场,从而最终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国家(地区)建设模式的特征则是:一国政府在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充分的情形下,抓住国内或国际金融市场的特定契机,利用国内特定城市或地区的地理区位优势或经济环境等优势,经由政府推动和政策支持而在短时间内超前发展形成金融中心。这类国际金融中心以新加坡、法兰克福为典范,多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地区)。新加坡本不具备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但其政府利用有利的经济地理与时区条件,有意识地扶植国际金融业务的发展。法兰克福则得益于欧洲一体化、欧洲央行的建立和统一货币,虽然欧洲一体化是经济增长的内在需要,但法兰克福从德国走向欧洲确实是在欧洲央行成立之后。

(二)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的研究综述

就应用型研究而言,亚太和中东地区新兴金融中心城市的出现,扩展了国际金融中心研究的理论视角。然而,很难预期是哪个具体的环境因子会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不但取决于不同城市的静态环境比较优势,而且取决于城市政府政策的动态竞争环境优势。由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各环境要素的内在联系及其整体合力机制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实际影响。

1. 国外研究综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经济学家显示出对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研究的兴趣,如 Fanno(1933)重视区位优势,提出了地理中心化理论;Powell(1915)在讨论伦敦银行集聚过程中采用了自然选择理论;早期城市经济学家如 Gras(1922)、Jean Labasse(1955)、Duncan(1960)和 Vernon(1960)等人则从城市功能分化、银行网络联系、都市等级划分、交通地理位置和金融机构集中等方面讨论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问题。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金融发展理论的兴起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约翰·格力、R.戈德史密斯、爱德华·肖、麦金农等从多方面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强相关关系。

Kinderberg(1974)以上海和贝鲁特这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衰落为例讨论政治(包括战争)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兴衰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将规模经济理论和集聚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金融中心研究,得到了 Park(1982)后续研究的支持。

新制度经济学派则从制度约束、路径依赖、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角度分析了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的基本体系问题,如 Goldberg(1988)对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水平、金融活动的广度、金融制度的健全等环境因素的强调;Thrift(1994)以“路径依赖”理论解释金融产业向金融中心聚集及一个城市长久维持区域内优势的原因;Zhao, Smith & Sit(2002)则以信息外部性及不对称信息作为塑造金融中心及影响其地区等级和全球层次的重要因素;Gehrig(1998)重点分析了信息对金融中心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现代学者还努力将文化、历史等非经济因素引入现今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研究。Choi et al 等人(1996, 2002)对全球 14 个金融中心进行实证分析,研究非

经济因素对世界金融服务和金融中心格局的动态影响;Risto Laulajainen(1998)通过比较研究指出,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监管环境与税收制度、时区优势、信息优势、人才优势是决定金融中心形成及其国际地位的关键环境因素。

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潘英丽(2003)、李扬(2003)、张志元(2006)、黄解宇和杨再斌(2006)尝试将金融地理学、空间经济学与金融集聚论融入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研究。胡坚(2003)、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则结合经济、金融、政治和法律等多种影响因素分别构建了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估指标体系。

部分国内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问题,如游碧蓉(2001)回溯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百年变迁过程,洪葭管(1985,1989,1996)、杜恂诚(1999,2003)、吴景平(2002,2003,2005)对上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远东金融中心地位和发展环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由于中国历史经历中国际金融中心数量少且历史短,所以这类研究不够系统和全面。

冯德连、葛文静(2004)构建了“轮式模型”来解释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动力机制,包括两种拉力(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三种推力(供给因素、历史因素和城市因素)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作用力。该研究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金融中心形成的外部动因。

国内对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研究最具有创新和中国特色的理论贡献是周小川将生态学概念引入到金融领域而提出的金融生态系统理论。在此基础上,李扬(2005)、徐诺金(2005)对金融生态系统的概念和理论进行了扩充完善,杜朝运(2007)、赵立平和邵挺(2008)、陈华(2009)等学者则实际运用金融生态系统理论分别研究了厦门、温州和我国农村地区金融的发展问题。

上海金融学院对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理论集群。该校从2006年起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蓝皮书》,逐年比较上海与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从不同纬度探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的各种环境制约因素,寻求可能的解决路径。该校的学者李豫(2010)、朱文生(2010)、李雪静(2010)、肖本华(2011)等人也分别从领导体制、社会信用体系、政策支持体系等角度对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进行了研究。

(三)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的基本要素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尽管国际金融中心的初期形成往往具有历史偶然性,但如下要素在其发展和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一,便利的交通与发达的基础设施,优越的地理与时区位置。便利的交通和发达的基础设施是跨国公司、金融机构选址的基本因素,为金融积聚提供了生活便利这一最基本的外部条件。例如,中国香港、新加坡、纽约、伦敦都是重要港口与商品集散地。优越的地理与时区位置保证世界金融市场24小时连续交易,提升了该城市的竞争优势。例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恰处于纽约与欧洲金融中心交易时间

的连接处。

第二,国内或区域内稳定的政治局面,发达的经济水平及广阔的市场前景。政局稳定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政局动荡、变革经常发生、国内经济和金融不稳定,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便无从谈起。高度发展的经济水平、广阔的市场前景意味着不断增长的产品和资金需求,日益频繁的资金输出或输入是金融积聚的重要因素,深刻影响着外国金融机构的选址。

第三,货币的可兑换程度。一个城市想建成国际金融中心,首先要求该国的货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兑换,否则以该国货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交易、资本输出、结算,以及产品和服务创新等都将受到限制;反之,如果一国或地区的货币是世界本位币,则该国或地区就具备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

第四,完善的市场结构,开发、自由的市场体系。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票据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可充分发挥金融中心的规模经济与积聚效应,扩大其辐射深度与广度。开放、自由的市场体系意味着国外金融机构较低的进入成本,可保障国际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充分流动与积聚,增强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第五,规范而有利于创新的监管体系。从发展历史而言,政府既要国际金融中心进行严格的监管以防范金融风险,又要提供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前者是国际金融中心持续发展的前提,后者是国际金融中心动态发展的基础。

第六,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业作为管理风险的行业,直接与信息不确定性相关。金融中心通过高质量的金融基础设施,如征信系统、清算系统及高效率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可以充分获取实时、客观反映市场、机构、工具和产品变化和发展的各种信息。

第七,专业的国际金融人才。人才,尤其是金融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金融中心的活力和发展潜力。拥有一支兼具国际金融理论和实务经验的专业人才队伍,是向市场参与者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的“软件”保障。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人才要流向边际产出最多的城市,人才机制直接影响着人才这一要素的成本与收益,因而是影响人才流向的首要因素。

二、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研究的基础理论

完善优化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的丰富实践,推动着学者们运用不同的金融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除了主流的经济金融理论,其他众多的新兴学科和理论也不断向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的研究靠拢,最终形成了“路径依赖是基础—功能观是延伸—金融生态学是趋势”的理论发展脉络。有鉴于此,本书对路径依赖、金融功能观以及金融生态理论进行重点研究。

(一)路径依赖理论

国际金融中心的选择虽具偶然性却非完全随机,其发展轨迹反映了历史对现在和将来的影响,因而体现了路径依赖的作用。路径依赖思想最早见于 P. A. David